

曾被黄宗羲许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其实际的文学成就并没有通常想象中的那么高，这很可能与其思想受到正统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强大影响有关，这种倾向对于纯文学所必需的真性情的自由抒发以及对审美性的追求，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就总体来说，归有光的文章也是崇儒阐道那一套。只是有少数文章，还能在不违背‘道’的前提下以情动人，那就是《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寒花葬志》几篇。”^[1]

这“少数文章”，几乎全都与“家庭私情”有关。家庭是展现真性情的场所，社交性、事务性的伪饰在这个场所中会自然而然地脱卸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怀人名篇的相似之处在于，均以家庭为对象，以自己的成长感受为内核，写得可谓“风神摇曳、情韵深长，于平淡琐细中寄寓沧桑之感”^[2]；不同之处在于，缅怀故去的亲人，回忆逝去的往昔，都由这所名为“项脊轩”的小小书斋串联起来。

作为书斋的项脊轩，事实上是归有光的一个矛盾“情结”所在。明清时代的江南，书斋作为庭院建筑的一部分，成为文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生命依托之所，由此形成了和西方“书房”文化迥异其趣的“书斋文化”。士大夫在书斋的方寸天地中，“将经营书斋作为寄情人生的文化载体，书斋的意境、陈设、器具等都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书斋也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和心灵栖息之地”^[3]。归有光和他的项脊轩，同样如此。书斋中所包蕴的“文化基因”，既时时

书斋文化观照下的《项脊轩志》

江苏省天一中学 唐 纛

触动他的“文化神经”，又与现实中的种种不堪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项脊轩作为归有光“独语”的天地，给予了他无限的庇护与安慰；然而，书斋之外，生活的艰辛悲苦纷至沓来。归有光年轻时始作《项脊轩志》，多年后回头重新审视自己的这段生命历程，封存的记忆瞬间被激活，情感的大门再次轰然打开，而这正是《项脊轩志》感人的重要内因之一。

一、书斋：追慕圣贤的教化之地

归有光有这样一段记述：“余读书于陈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开门见山，去廛市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每环坐听讲，春风动帟，二鹤交舞于庭，童冠济济，鲁城沂水之乐，得之几席之间矣。”（《群居课试录序》）^[4]这是归有光30岁时在马鞍山陈仲德家塾读书时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他对理想书斋生活的一种表达。

30岁的归有光，回想10余年前“束发读书轩中”的生活，与目下的陈氏家塾相较，一定会对项脊轩的窄小阴暗、简陋破旧，即所谓“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等情景，大生感触。但是，书斋面貌可以不同，书斋中人的追求却并没有改变。当年他的祖母来轩中探望他时，就曾疼惜这个孙儿“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在项脊轩中读了哪些书，《项脊轩志》中没有记载，但祖母“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喃喃自语，和她所拿来“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的笏板等，对归有光苦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强大激励作用，是不难想象的。

明代科举进入鼎盛时期，文人真正挤上独木桥的时期也正由此始，科举之风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各个角落，一般读书人，很少有从一开始就绝意仕进的。书斋，就是文人出将入相、致君尧舜自我人生规划的起点，书斋中的苦读勤修，将决定这样的人生梦想能否实现，所谓“枕经藉史，家弦户诵”^[5]的现象绝非虚言。归有光同样不例外。他14岁应童子试，20岁补生员，23岁乡试落第，此后一直到35岁才考中举人，中进士更是晚至60岁^[6]，在科举战场上奋斗了大半辈子。归有光30岁时，正值再接再厉准备洗刷前耻的备考时期，但他描述的，却不是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却是每日与知己好友一同沉浸在平淡而丰富读书生活中时的“超然”与“鲁城沂水之乐”，这种情怀力量，不能不说与圣贤的风雅教化，与孔颜乐处的熏染相关，“春风动帟”的景象也俨然“春风大雅吾与点”情味。居官后的归有光，“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讞遣去，不具狱”^[7]。这正是年轻时代追慕孔孟之道的结果。

圣贤教化，王道泱泱，风雅填膺，曾让项脊轩中年轻的归有光抱持着好梦，人格的修养，功名的收获，家庭亲族的荣辱，这一切都将从这所小小的书斋出发。让他意想不到的，当年轩中的苦读，竟然演变成以后数十载的苦涩，这样的经历，当然会使他感到愧对亲人，也就难免“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了。

二、书斋：虚室生白的坐忘洞天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世界，永远会有“出处语默”这样一对矛盾存在。入世的渴求，使他们希冀于圣贤大道；而功成身退的出世愿景，又使他们对于恬淡自在的隐退生活羡慕不已。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最具象的体现，可以说就是士人存身的书斋。入世，靠的是斋中的发奋向上；出世，靠的是斋

中的独立空间。

“出世”的理想，与老庄道家文化密切相关，而由道家文化衍生而来的道教，更是建构起对尘俗中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所谓“洞天福地”系统。对于普通的士人而言，难以真正踏足神山仙岛，那就不妨将自己的书斋打造成“别有洞天”。前引《群居课试录序》中的“去廛市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就流露出浓厚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式的隐士雅洁之乐。“古代的书斋文化，讲求斋外、斋内以及斋人三者浑然一体，在意境上追求古雅、幽静、洁逸，斋主情操则追求淡泊自乐，使意境与情操相统一。”^[8]这种统一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体现在项脊轩的生活细节中。“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正是“香草美人”式的生活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中，隐含着屈原式的“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王维式的“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苏轼式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永遇乐》）。在这样的清韵中，是可以让人聊以忘忧的。学业的艰苦，家庭的纷扰，此时此刻，都可以得到暂时的超脱。

“天人合一”也体现在物我两忘的细节中。文中有这样一句，“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这仅仅是描写轩庭的清静吗？如果轩中主人是一个急躁好动之人，那么小鸟定会惊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景不正是古人所羨称的“鸥鹭忘机”吗？晚唐陆龟蒙曾喟叹：“除却伴谈秋水外，野鸥何处更忘机？”（《酬袭美夏首病愈见招次韵》）归有光不用喟叹，因为在小鸟啄食不去的此刻，就已经实现了物我两忘的“忘机”境界。

归有光对自己这种寒斋独处而神在天外的生活，是颇为自得的。他所仰慕的圣人之一朱熹，曾想在罗浮山中静坐十年，对此，归氏曾用“项脊生”的斋号评价道，这样做固然可以在“莽苍之际，小丘卷石，古树数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但是，自己所

在的东南胜地，有吴中名山、林屋洞庭，自己“遥望者几年矣，尚不得一至”却并不介意，“盖君子之学，有不能屑屑于事者矣”，因为“何必罗浮，能敬斯静”，只要项脊轩在，就“能识鸢鱼，物物道真”。^[9]

庄子曾有“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之说，司马彪注云：“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又有“坐忘”（《庄子·大宗师》）之说，郭象注云：“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这就是项脊轩带给项脊生的“天人合一”之境。归有光用一个细节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那样的情态：“偃仰啸歌，冥然兀坐。”可是，人真的能“坐忘”吗？《项脊轩志》初作于归氏“束发读书”之时，却在35岁时再加补记。因为这一年，正是归氏中举之年，他似乎觉得人生光明的大幕即将拉开，圣贤事业正在召唤自己，预先构想的人生归宿似乎也隐然可望。但是，母亲、祖母、妻子魏氏，这三个给予他最深沉亲情与爱的女性，却早已不在人世，睹轩而思人，轩也就成了伤心之地，之所以题为记轩而行文接连记人，“在作者，是有意要将它融入原文成为一体的。因为，母亲、祖母、妻子的点滴之事，是他关于项脊轩最为动情、最为难忘的记忆”^[10]。不仅如此，连给他生过女儿的侍婢寒花，也已经去世五年，而自己的仕途前景依然渺茫无期。面对这样的人生坎坷与悲辛，实在是很难超然出尘的。

项脊轩，可以让轩中人暂忘艰辛于一时，却不能忘却一世。当归有光最终迁居外地之后，留给项脊轩主人的最后记忆，大概只有那棵孤独与轩相伴的“亭亭如盖矣”的琵琶树了。轩中度过的岁月，竟然要用这棵孤独伤心之树画上一个句号，如此复杂的人生况味，都凝聚在“项脊轩”这座书斋之中，也证明了士大夫要真正达到“坐忘”的境界，是何等的困难。

三、书斋：心无挂碍的豁达场域

《项脊轩志》中有一处文字历来颇受讨论，那就

是“借书满架”中的“借”字。黄宗羲《明文海》作“措”，四部备要本《震川先生集》作“积”，周本淳点校本及多数通行本作“借”。一字之异，背后折射的却是文情与人性的不同，我们不妨从项脊轩命名缘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传统文人的书斋起名有“九大类型”：标明斋主字号；表达爱书情感；夸耀珍本秘籍；炫示藏书数量；纪念宗亲先贤；展现地理环境；阐述治学之道；披露心态品性；反映意趣爱好。^[11]

那么，“项脊轩”属于哪一类呢？一说“项脊”之名可能因为归氏宋代先祖归隆道所居之地为太仓项脊泾^[12]，则“纪念宗亲先贤”当有可能；也有的认为归氏言书斋逼仄，“屋小仅及项脊”^[13]，则“展现地理环境”，也有可能。余下的当以“炫示藏书数量”和“披露心态品性”最有可能。

书斋本是藏书读书之所，古来士人皆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藏书丰富，自然与治学深入、腹笥渊博相联系，清代张潜也确有过“中有项脊轩，卷帙每盈几”（《归太仆故宅诗》）的描述。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项脊轩“室仅方丈”，即便“满架”是书，又能有多少？加之“北向”阴潮，是否宜于炫示藏书之富？与归有光同时代而稍晚的高濂曾这样规划书斋：“斋中长桌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右列书架一”（《高子书斋说》）^[14]。这样的布局，流露出和明清造园艺术相似的情趣追求：简洁、疏淡、秀气。很难想象，懂得独享偃仰啸歌之乐，懂得独对三五之夜、明月半墙的青年归有光，会在项脊轩的特殊条件下，一味追求“措”的乱放或“积”的数量，把小轩弄得填塞拥堵，从而与轩外的环境扞格难通。

“善处穷”的人，自然就能心无挂碍，自然就能“去麇市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这种通透豁达的处世观，可以说贯穿了归氏一生。在中进士后，他为一位科举同年的八股文集作的序中这样说道：“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谓之数

云尔。曰数,则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则适然而已。”(《王梅芳时义序》)^[15]这样的人生“适然”观,与其说完全来自归有光人生晚期的深刻总结,不如说在当年窄陋的项脊轩中那个通达不以“借书满架”为意的年轻人身上,就早已经积淀下了。

“借书满架”,“意豁如也”,这样的截搭,庶几可以见出项脊轩中之人其意态澹澹扬扬之姿。

问题是,真的能“豁如”吗?人还未老,大家庭却已从聚族而居的其乐融融走向了分崩离析的人情冷漠,“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不唯如此,防亲人如防外贼,“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这些在年轻的归有光眼中,该是怎样的失落?轩中片刻的宁谧自在,暂时的洒脱无迹,又怎敌他“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的纷杂不堪?这就难怪在这些混乱的情景记述之后,忽然接续“家有老妪,先妣抚之甚厚”一节文字了。设身处地,令数百年后的读者也不禁为之鼻酸!

四、结语

美国已故的当代最杰出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曾高举“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的大旗,因为有大量的“阐释”认为“艺术家本人的意图无关紧要”,于是随心所欲地申说,“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16]。然而,我们面对一个历史的艺术文本,却又不得不“阐释”,因为,“要理清、把握一个时代文学的脉络、趋势和转变的契机,不能不探究文人群体的心灵世界、心态律动、心路历程。文心文风是士心士风的显现、写照,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亦即一个时代士林心灵史”^[17]。

书斋,一个风雅脱俗之地,是最适宜于文人士大夫寄托心灵的人间山林,也难怪连东瀛学者都敏锐觉察到,归有光的散文是立足于“狭窄性与洁癖性之

上”^[18]的,前者与其道学思想有关,而后者则与书斋文化的熏染相关。■

参考文献

- [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中国文学史新著[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0.
- [2]林如敏. 归有光散文的中庸性[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7).
- [3]施晴.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书斋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2.
- [4][6]张传元,余梅年. 归震川年谱[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4,62.
- [5]王凯旋.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D]. 吉林:吉林大学,2005.
- [7][清]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7382.
- [8]暴洪昌. 明清时代书斋文化散论[J]. 齐鲁学刊,1992(2).
- [9][15]赵伯陶. 归有光文选[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72,251.
- [10]贝京. 归有光《项脊轩志》细读[J]. 名作欣赏,2005(11).
- [11]苏广利. 我国私家书斋名称的九大类型[J]. 图书与情报,2002(1).
- [12]冯其庸等主编. 历代文选(下册)[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218.
- [13]刘世德. 明代散文选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5.
- [14][明]高濂著,王大淳点校. 遵生八笺[M]. 成都:巴蜀书社,1985:306.
- [16][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 反对阐释[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17]夏咸淳. 明代文人心态之律动[J]. 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7).
- [18][日]佐藤一郎著,赵善嘉译. 中国文章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99.